

越南愛國志士潘佩珠之雙元性中華觀

張 哲 挺*

摘 要

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東亞各國承受西方列強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巨大的衝擊與挑戰，潘佩珠所處的時代正是處於越南歷史的轉折點上。在當時法國殖民與亞洲主義的背景下，潘佩珠孕育出其特殊的中華觀，富有時代意義。不論越南的潘佩珠、日本的曾根俊虎及大隈重信與中國的孫中山所主張的亞洲主義內涵皆強調同文同種同洲。潘佩珠認為，越南是亞洲的文明古國，與中國並列為亞洲歷史最悠久的國家，而且在地理、歷史、人種、文化等各方面都跟中國有密切的關係，甚至認為自己是漢人。他不僅認為中越兩國是兄弟之國的關係，並認為中國是全亞洲的兄長，應該擔當起領導亞洲的重任。受到傳統越南的二重朝貢體制所影響，潘佩珠建構未來的世界圖像，希望中國成為亞洲的領導者，中越為兄弟之國，而越南則成為東南亞及南亞諸國的領導者。潘佩珠的思想體現中越同祖觀及中越兄弟觀，同時深具漢文化意識。至於越南的主體意識，猶如兄弟分家之後，各自獨立發展，潘佩珠也與其他越南人一樣具有強烈的國家主體意識。這突顯出潘佩珠的雙元性中華觀，既有人種、文化上的漢人與漢文化認同，又有政治上獨立於中華的主體觀。

關鍵詞：越南、潘佩珠、中華、東亞、亞洲主義

2018年6月14日收稿，2019年10月29日修訂完成，2020年7月10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一、前言

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以來，東亞各國皆面臨西方列強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全方位的挑戰與壓力。面對此一局勢，東亞各國皆尋求變革以發奮圖強。在此一歷史的轉捩點上，越南愛國志士潘佩珠（Phan Bội Châu, 1867-1940）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潘佩珠原名潘文珊、別名潘是漢、號巢南，生於越南乂安省（又稱義安省）南壇縣，是近代越南知識分子中最早具有現代化世界觀、全面了解世界格局的先驅者。1861 年法軍進攻越南南圻，迫使越南阮朝（1802-1945）在 1862 年與法國簽訂《第一次西貢條約》，割讓嘉定、邊和、定祥三省及崑崙島給法國。1883 年，潘佩珠 16 歲，法軍進攻越南，兵臨首都順化城下，迫使越南與法國簽定《第一次順化條約》，使越南淪為法國的保護國。1885 年他號召同學組成「試生軍」抗法，但因法軍已攻陷乂安城，尚未開始行動即予解散。之後為了打響知名度以領導越南民眾抗法，他開始致力於準備科舉考試。在 1900 年考取科舉之後，他就轉而積極進行抗法運動，他遊歷了中越數個省份，與抗法份子聯繫並採取抗法行動計畫，內容包括三點：1. 團結全國各地零散的抗法組織，2. 尋求越南皇家與官僚系統的支持，3. 獲得外國的援助。¹在當時法國殖民的背景下，身為越南愛國志士的潘佩珠透過文章和小說來鼓舞越南國家獨立的抗法意識，進而能採取實際行動，實現國家獨立之重光。

面對西風東漸，西方文明強勢傳播到全球的情勢，日本是適應轉化最為良好的國家，經歷了明治維新的全方面改革，日本成為東亞最早的先進國家，已成為東亞各國維新變革之典範，日俄戰爭（1904-1905）後，日本擊敗西方強權之一的俄國，震驚了東亞的知識份子，因而帶起了一波東亞各國大量留學日本的風潮，潘佩珠也在當時號召了「東遊運動」（Phong trào Đông Du），其目的是向國外求援以便在國內進行抗法運動以及鼓勵留

1 見（越南）潘佩珠，《潘佩珠年表（抄本）》（河內：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院藏），編號：Vhv.2138，無頁碼；William J. Duiker, “Phan Boi Chau: Asian Revolutionary in a Changing Worl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1(1971.11): 77-88.

學生赴日學習，如東亞同文會所設立同文書院及日本的振武學校等。從 1905 年到 1908 年，留日學生的總數約達二百人之多，大部分來自南圻。潘佩珠在日本旅居時期，曾與中國的革命家孫中山（1866-1925）、維新派梁啟超（1873-1929）以及日本政界要人如犬養毅（1855-1932）、大隈重信（1838-1922）、宮崎滔天（1871-1922）等人接觸，尋求援助。他在旅日期間撰寫了《越南亡國史》一書，在東京出版，並把《提醒國民歌》、《海外血淚書》等著作寄回國，在國內進行宣傳，因而大大地影響了一些愛國的士大夫，使他們響應抗法運動。²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梁啟超為東亞文化交流圈的關鍵人物，很多東亞知識分子在建構其自身的知識與概念系統時，常受到梁啟超的影響或「啟蒙」，進一步與東亞及世界潮流接軌。潘佩珠正是受到梁啟超等人影響的東亞知識分子之一。潘佩珠的閱讀書籍包括梁啟超所著的《戊戌政變記》、《中國魂》、《自由書》及《新民叢報》、〈意大利三傑傳〉等書，以及越南重要士人阮尚賢（Nguyễn Thượng Hiền, 1868-1925）曾借給他的《中東戰紀》、《瀛寰志略》、《普法戰紀》，以及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民約論》、孟德斯鳩（Charles-Louis de Montesquieu, 1689-1755）的《法意》等書。³

根據《潘佩珠年表》，潘佩珠將自己的人生歷史分成三紀（三個時期）。第一時期與第二時期以 1900 年考中鄉試榜首作為分期點，此後為壯年期；第二時期與第三時期以 1905 年出洋為分界點。⁴ 潘佩珠對自己的人生進行這樣的歷史分期，表示他把鄉試榜首與出洋這兩件事情作為他人生的兩大重要里程碑。第一時期所追求的是考取功名以獲得知名度來領導抗法運動，第二時期逐漸發展出國際觀為出國遊學做準備，第三時期則是他出國之後世界觀逐漸成熟的時期。

有關潘佩珠的文獻回顧的研究部分，有越南學者章收（Chuong

2 （越南）陳輝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北京：三聯書店，1973），頁 188-189。

3 羅景文，〈東亞漢文化知識圈的流動與互動——以梁啟超與潘佩珠對西方思想家與日本維新人物的書寫為例〉，《臺大歷史學報》48(2011.12): 51-96。

4 （越南）潘佩珠，《潘佩珠年表（抄本）》，編號：Vhv.2138，無頁碼。

Thâu)、陳義(Trần Nghĩa)及臺灣學者羅景文等研究者針對潘佩珠的研究概況進行回顧,陳義有〈回顧潘佩珠的研究情形〉一文,⁵章收則有〈從過去到現在關於潘佩珠的研究情形〉、〈一些關於潘佩珠必須繼續研究的問題〉、〈近年來關於國外研究潘佩珠的情形〉三篇文章,⁶羅景文曾經在其博士論文「潘佩珠及漢文小說之研究」⁷及〈潘佩珠研究述評(1950-2010)及其漢文小說研究之意義〉⁸之文中進行詳細精闢地文獻回顧,說明了自1950年至2010年這六十年來越南學界研究潘佩珠的概況。羅景文從歷時角度將這六十年越南學界對於潘佩珠的研究成果分為第一階段(1950年至1970年)、第二階段(1970年到1990年)及第三階段(1991年至2010年)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著重作者生平與文獻的考訂整理;第二階段潘佩珠的研究熱度有降溫的趨勢,1990年整理出版的《潘佩珠全集》十冊,⁹

5 「(越南)Trần Nghĩa 陳義,“Nhìn Lại Tình Hình Nghiên Cứu về Phan Bội Châu 回顧潘佩珠的研究情形,”收入(越南社會科學委員會)Viện Văn Học 文學研究所編,《Nhà Yêu Nước và Nhà Văn Phan Bội Châu: Kỷ Niệm 100 Năm Ngày Sinh Phan Bội Châu 愛國者與作家潘佩珠——潘佩珠百歲誕辰紀念論文集(Hà Nội: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社會科學出版社), pp. 321-352.」轉引自羅景文,「潘佩珠及漢文小說之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頁5,註13。該博士論文已經出版成書,見羅景文,《憂國之嘆與興國之想——越南近代知識人潘佩珠及其漢文小說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20)。

6 「(越南)Chương Thâu 章收,“Tình Hình Nghiên Cứu Phan Bội Châu từ Trước đến Nay 從過去到現在關於潘佩珠的研究情形,”*Nghiên Cứu Lịch Sử* 歷史研究 104(1967.11): 6-16; Chương Thâu,“Một Số Vấn Đề Cần Tiếp Tục Nghiên Cứu về Phan Bội Châu 一些關於潘佩珠必須繼續研究的問題,”*Thông Tin Khoa Học Xã Hội* 社會科學通訊 1993.1: 56-62。此文亦載於 Chương Thâu, *Nghiên Cứu Phan Bội Châu* 潘佩珠研究 (Hà Nội 河內: NXB Chính trị quốc gia 國家政治出版社), pp. 747-755; Chương Thâu, “Về Tình Hình Nghiên Cứu Phan Bội Châu ở Nước Ngoài Những Năm Gần Đây 近年來關於國外研究潘佩珠的情形,”*Nghiên Cứu Văn Học* 文學研究 2008.4: 3-14.」轉引自羅景文,「潘佩珠及漢文小說之研究」,頁5,註14。

7 羅景文,「潘佩珠及漢文小說之研究」,頁5-14。

8 羅景文,〈潘佩珠研究述評(1950-2010)及其漢文小說研究之意義〉,《國家圖書館館刊》101.1(2012.6): 165-194。

9 Phan Bội Châu 潘佩珠, *Phan Bội Châu Toàn Tập* 潘佩珠全集, in Chương Thâu 章收, ed. Huế 順化: Nhà Xuất Bản Thuận Hóa 順化出版社, 1990。本文原引用文獻篇名或書名如為中英文以外之語言,為使讀者瞭解其意義,故在篇名或書名後並列中文翻譯,以

為日後研究潘佩珠者須參考的重要著作。第三階段是越南學界研究潘佩珠邁向多元視野、互動交流的時代。依據羅景文的研究發現，越南與西文學界較著重在越南反殖民運動脈絡裡，潘佩珠與同世代的民族運動者的歷史定位與意義。而日本與中文學界的研究傾向都是從自身出發，思考自身對潘佩珠及越南民族運動的影響，或是強調彼此之間的關係。¹⁰

在 2018 年 6 月羅景文最新的研究〈對 2010 年後中文學界研究潘佩珠之成果的觀察——兼論與潘佩珠相關之組織和人物在華活動情形〉（〈2010 년 이후 中文學界 潘佩珠 연구 성과에 대한 고찰——潘佩珠 관련 조직과 인물의 재중국 활동 양상과 더불어〉）（刊登於韓國《漢文學報》第 38 輯）¹¹ 中有重大發現。在過去，潘佩珠的研究者們皆認為潘佩珠所著的《聯亞葛言》已經佚失，而羅景文於 2016 年 7 月在檢索報刊資料庫中越南人在華活動之相關資料時，找到由牟樹滋（生卒年不詳）所撰之〈讀《聯亞葛言》有感〉一文，刊載於北京《順天時報》第 3189-3193 號（1912 年 9 月 24 日至 29 日，共分五期刊載，因為 9 月 25 日為中秋節，故於 26 日停刊一天），第 2 版所引述。根據羅景文的統計，牟氏之文全文七千七百字左右，引錄《聯亞葛言》之處有四千一百字，占全文二分之一強，這樣的篇幅雖然與潘佩珠所說《聯亞葛言》有「數萬言」的量有一段距離，但這些內容應該是《聯亞葛言》中較重要的文字。¹² 而根據羅景文觀察 2010-2017 年中文學界研究潘佩珠的概況，發現有兩項學術趨勢：1. 先前的研究較注重潘佩珠的政治與革命方面，近期的研究擴及其對中越日等國在思想、文化與社會層面的交流。2. 過去有關潘佩珠的研究

下全文皆同，不另作說明。

10 羅景文，「潘佩珠及漢文小說之研究」，頁 5-14。

11 羅景文，〈2010 년 이후 中文學界 潘佩珠 연구 성과에 대한 고찰——潘佩珠 관련 조직과 인물의 재중국 활동 양상과 더불어〉（〈對 2010 年後中文學界研究潘佩珠之成果的觀察——兼論與潘佩珠相關之組織和人物在華活動情形〉），《漢文學報》38(2018.6): 257-356。

12 羅景文，〈2010 년 이후 中文學界 潘佩珠 연구 성과에 대한 고찰——潘佩珠 관련 조직과 인물의 재중국 활동 양상과 더불어〉，頁 327-329；牟樹滋，〈讀《聯亞葛言》有感〉，《順天時報》第 3189-3193 號，1912.9.24-25、1912.9.27-29，第 2 版。

較少涉及潘佩珠所著的漢文小說，近期研究其漢文小說，既有助於瞭解他的心路歷程與精神境界，且能更進一步探索東亞近現代歷史、文化、文學與社會等各方面的對話。¹³

筆者在章收、陳義、羅景文等研究者之大量文獻探討所奠定的基礎上，進一步考察近年來（2011 年至 2018 年）學界研究潘佩珠的概況。近年來潘佩珠的相關研究主要有漢文小說、¹⁴ 東亞漢字文化知識圈、¹⁵ 國史論述、¹⁶ 越南觀、¹⁷ 日本觀、¹⁸ 潘佩珠與臺灣、¹⁹ 潘佩珠的儒教思想、²⁰ 潘佩珠對王陽明思想的研究²¹ 等。文獻回顧考察結果發現，雖有潘佩珠對越南「獨立於中華的越南政治主體意識」方面之研究，²² 但以目前

13 羅景文，〈2010 년 이후 中文學界 潘佩珠 연구 성과에 대한 고찰——潘佩珠 관련 조직과 인물의 재중국 활동 양상과 더불어〉，頁 354。

14 羅景文，「潘佩珠及漢文小說之研究」；羅景文，〈潘佩珠研究述評（1950-2010）及其漢文小說研究之意義〉，頁 165-194；呂小蓬，〈潘佩珠漢文小說評述〉，《人文叢刊》8(2014.6): 285-290。

15 陳益源、羅景文，〈越南潘佩珠與日本、中國之深厚關係——以潘佩珠對於西方建國英雄事蹟的吸收與轉化為例〉，《漢學研究學刊（馬來亞大學中文系）》1(2010.10): 119-141；羅景文，〈東亞漢字文化知識圈的流動與互動——以梁啟超與潘佩珠對西方思想家與日本維新人物的書寫為例〉，《臺大歷史學報》48(2011.12): 51-96；王志松，〈漢字與東亞近代的啟蒙思潮——梁啟超與潘佩珠的《越南亡國史》〉，《漢字研究》14(2016.4): 103-121。

16 羅景文，〈召喚與凝聚——越南潘佩珠建構的英雄系譜與國族論述〉，《成大中文學報》37(2012.6): 159-186。

17 張政偉，〈新民自尊——由梁啟超越南觀談起〉，《慈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刊》21(2018.10): 2-20。

18 劉先飛，〈東遊運動與潘佩珠日本認識的轉變〉，《東南亞研究》2011.5(2011.10): 69-73。

19 何純慎，〈越南潘佩珠與臺灣林獻堂民族思想之比較——以兩人與中國、日本的關係為中心的觀察〉，《慈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刊》14(2012.12): 27-43；蔣為文，〈越南民族獨立運動對台灣的啟發〉，《臺灣國際研究季刊》13.4(2017.12): 75-92。

20 (越南)Nguyễn Thọ Đức 阮壽德，"Tìm Hiểu Xu Hướng Hiện Đại Hóa Tư Tưởng Nho Giáo Trong Khổng Học Đăng Của Phan Bội Châu 潘佩珠《孔學燈》中儒教思想的現代化趨向探討," *Tạp Chí Hán Nôm* 漢喃雜誌 109(2011.12): 37-57。

21 (越南)黃文草，〈20 世紀初的越南學者對王陽明思想的研究〉，《王學研究》8(2018.11): 144-148。

22 例如羅景文的〈召喚與凝聚——越南潘佩珠建構的英雄系譜與國族論述〉一文是關於

東亞學界的研究來看，臺灣與越南皆受主體意識與脫華化的影響，而中國方面之研究又比較傾向於「自國中心主義」，故尚缺乏潘佩珠中華觀之相關研究。但其實應回到當時的時代背景及脈絡來探究潘佩珠自身的觀點，而不宜僅以現代人的角度來審視。又由於越南與中國同屬漢字文化圈，潘佩珠在吸收新學、新知之時，大量閱讀梁啟超等中國學者的書籍資料，又曾東遊日本，一方面浸潤於中國學者的觀點中，一方面又具東亞視角，故其中華觀深具特色。潘佩珠曾在其自傳裡說明其性格：「畢生所營謀，專問目的，期取勝於最後之五分鐘，²³ 至於手段方針，雖更改而不恤也。」²⁴ 因此其思維常變遷流轉，其中華觀有著多樣複雜的面貌，本文將結合潘佩珠之生平、性格，以及文本創作的時空環境、書寫策略及目的，進行更深入的分析。本文從亞洲主義背景下的潘佩珠、中越同祖觀、中越兄弟觀、獨立於中華的越南政治主體意識等部分來探究潘佩珠之雙元性中華觀。

二、亞洲主義背景下的潘佩珠

潘佩珠的中華觀是處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亞洲主義的脈絡下進行思考的，因此探討這個時期東亞各國的亞洲主義就格外重要了。特別是中國與日本的亞洲主義觀點。在中國與日本意識到自身是亞洲成員之前，歐洲人將歐亞大陸東部之非基督教徒居住地區劃定為亞洲，從近東到遠東層層施加壓迫；受歐洲侵略而被迫意識到自我存在，從而誕生了近代

潘佩珠對越南「獨立於中華的越南政治主體意識」方面之研究。參見羅景文，〈召喚與凝聚——越南潘佩珠建構的英雄系譜與國族論述〉，《成大中文學報》37(2012.6): 159-186。

23 「取勝於最後之五分鐘」為潘佩珠獨特之用法，表示用盡各種手段與方法堅持到底以達成功的目的之意。此亦見於其自傳中評論日俄戰爭日本戰勝的原因之處，他說：「此次日本勝俄，原因頗多，而日人能耐勞忍苦，其最大原因也。君等曾讀日本報紙，當能知之。征俄凱旋各報紙多歸功於大根，即蘿蔔根。日本醃此根為最普通之食品，當非戲言。夫以我國地瘠民貧，供應極苦，浩大之戰費，至於二年。使日軍人亦嗜牛肉酪醬如俄人，其何以堪？惟飽茹大根，與黑蕎麥，所以能收最後五分鐘之勝利也。」見〈越南〉潘佩珠，《潘佩珠年表（抄本）》，編號：Vhv.2138，無頁碼。

24 〈越南〉潘佩珠，《潘佩珠年表（抄本）》，編號：Vhv.2138，無頁碼。

的「亞洲」概念。結果「歐洲主義」的內容乏人問津，反而形成了主張與歐洲抗衡、強調自我存在的「亞洲主義」，對日本和中國來說，亞洲主義的基礎是在世界史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才形成的。既然亞洲主義與歐洲對亞洲的侵略相關聯，那其根本上包含著與歐洲相對抗的思想構造，且與亞洲地緣、文化具同質性連動。為了避免被侵略及敗亡，亞洲必須引進歐洲的先進科技與文明，即亞洲一方必須在與歐洲形成地理和空間性的對抗關係基礎上，走歐洲式富強的路線。因而亞洲主義必須在這種錯綜複雜的二重關係中形成。²⁵

日本亞洲主義的歷史階段劃分在思想史的演進上，日本學者狹間直樹（1937-）以 1880 年（明治 13 年）興亞會（以亞洲合作振興為目的的團體）的成立為起始點，以 1945 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為終結點，中間區分為三個時期：

1. 早期（1880-1900）：基本對等的國家關係。
2. 中期（1900-1928）：在列強國際協調框架下，以日本的優勢為軸心。自 1900 年義和團運動與八國聯軍攻入大清開始，至 1928 年濟南事件為止。
3. 晚期（1928-1945）：自 1928 年濟南事件始，日本不再與列強合作，放棄國際協調框架，只顧追求本國的利益。²⁶

考察潘佩珠的活動年代，年輕時他在越南從事抗法活動及致力於科舉，1900 年是一個分水嶺，這一年他參加鄉試考取解元，獲得功名。1905 年 6 月為了獲得援助而經香港抵達日本。他旅居日本近 4 年，1909 年 2 月被日本政府要求離境。潘佩珠旅日的期間正處於日本的亞洲主義的中期階段，日本政府重視與列強之間的協調，以日本自身的優勢為軸心，來處理亞洲各國事務。這時期日本視日本與亞洲各國為不對等的關係。潘佩珠感受到日本對越南不願伸出援手的態度。顯然地，潘佩珠期待的是日本能落

25 （日）狹間直樹著，張雯譯，《日本早期的亞洲主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頁 3。

26 同上註，頁 4-5。

實其亞洲主義早期的主張。

在日本與中國的亞洲主義方面，本文以曾根俊虎（1847-1910）與孫中山為例加以說明。曾根俊虎，號嘯雲，是儒學者曾根敬一郎之子，為明治維新後著名的亞洲主義者，也是孫中山和宮崎滔天的介紹人，1877年創立振亞社。振亞社的宗旨是諸國合作振興衰敗的亞洲。他在1874年12月著《興亞管見》一文，當中吐露了對亞洲各國受西方壓迫的痛心之情，並思考挽救之策。²⁷他說：

近擬倡開興亞一會，須在中東兩國²⁸，先為同心協力，興亡相輔。然後推及亞洲諸邦，共相奮勉，俾能自強獨立，庶可終雪會稽。……敢呈興亞管見一冊，敬表哀情。²⁹

曾根的觀點注重中日兩國之合作，進而聯合亞洲各國共同合作。這樣的亞洲主義尊重亞洲各國的獨立性、主體性，此種觀點也是潘佩珠所希望的。1874年12月，曾根在西湖旅遊寫下了《清國漫遊志》，寫下了同文同種之詞，這也代表了亞洲主義中，中日兩國同屬黃種人、同屬漢字文化圈，應團結一致，協力復興。他說：

方今亞洲中，其得獨立者，僅有日清二國而已。況同文同種，唇齒之誼，當視為一家。而我兩國，向來不重主權，受歐美之凌辱，尤當協力恢復，何不忍一家庭之小嫌隙，以亂大謀焉。《詩》曰：「兄弟鬩牆，外禦其侮。」³⁰豈非徒言哉。是我欲洗耳，竟江湖行。³¹

27 同上註，頁15-23。

28 謂清、日兩國。

29 (日)曾根嘯雲，《清國漫遊誌之續》，《興亜會報告》第22集，1881.11.30，收入(日)黑木彬文，(日)鱒澤彰夫編輯、解說，《興亜會報告・亜細亜協會報告》(東京：不二出版，1993)，頁40-41。

30 出自《詩經·小雅·常棣》。原文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見漢·毛亨傳，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0)，卷9〈小雅·常棣〉，頁318。

31 (日)曾根嘯雲，《清國漫遊誌》第1編，收入《興亜會報告》第20集，1881.9.20，收入(日)黑木彬文，(日)鱒澤彰夫編輯、解說，《興亜會報告・亜細亜協會報告》，頁9-10。

曾根認為亞洲國家中僅日中兩國獨立，因此尤其期盼中日兩國團結合作，恢復主權，當時日本的明治維新才剛開始，日本與中國一樣接受西方列強不平等條約束縛，尚未恢復主權。曾根在此提出日中及亞洲各國共同合作，站在平等的立場上，共同振興亞洲。曾根認為不僅對中國，對朝鮮也應該持有對等關係。³² 由此判斷，曾根採取的是亞洲各國平等交往的亞洲主義政策。這也是潘佩珠所期盼的亞洲主義政策。

1905 年日本在日俄戰爭的勝利是歷史的重大轉捩點。日本的亞洲主義精神在這年發生重大轉折。孫中山對此評論道：

就大亞細亞主義精神言：實以真正平等友善為原則。日俄戰前，中國同情於日本；日俄戰後，中國反不表同情。其原因：在日本乘戰勝之勢，舉朝鮮而有之。朝鮮果何補於日本？然由日本之占領朝鮮，影響於今後之一切者，不可以估量。此種措施，為明智者所不肯為！³³

在 1905 年日本戰勝俄國之前，亞洲各國對日本抱著期待學習的心情，也盼望日本的援助。潘佩珠也是帶著這樣的心情於 1905 年前往日本。但事與願違，日本在戰勝俄國之後的發展卻是走向侵略擴張的道路，併吞朝鮮即是日本的第一步，潘佩珠也看出了日本有侵略亞洲的意圖，日本不但未能在軍事及外交上給予越南協助，1909 年為了重視與法國的關係，甚至驅逐越南留學生離開日本。1905 年也是中日關係的重大轉折點，1905 年日俄戰前，中國同情於日本，以日本之勝俄國為喜。日俄戰後，因為日本加速併吞朝鮮的步伐，中日關係也隨之緊張，兩國漸行漸遠。孫中山認為日本這樣的措施是非常不明智的，顯示他贊同平等友善的亞洲主義精神。

關於潘佩珠的亞洲主義，潘佩珠在寫給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的書信〈上大隈重信伯爵書〉中說：

知伯爵有哀憫同種之仁，有保全東亞之義。³⁴

32 (日) 狹間直樹著，張雯譯，《日本早期的亞洲主義》，頁 27。

33 胡漢民，〈大亞細亞主義與抗日〉，《胡漢民先生文集》第 2 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8），頁 539。

34 Phan Bội Châu, “Thư ông Đại Ôi Trọng Tín Bá tước thư上大隈重信伯爵書,” in Chương Thâu, ed., *Phan Bội Châu Toàn Tập* 潘佩珠全集, tập 2 第 2 冊 (Huế: Nhà Xuất Bản

潘佩珠一方面讚揚大隈重信之仁義，一方面也表現出潘佩珠和大隈重信皆有東亞一體的胸懷，也認為越南、日本等東亞各國皆有同種之誼。潘佩珠又說：

夫豈亞洲中無文明之國乎？夫豈亞洲中無雄伯之國乎。越南非歐洲之越南，乃亞洲之越南也。越南既為帝國同種之國，越南又為帝國同文同洲之國，……。夫日本帝國之威行於西北矣，行於清俄矣。豈恐使同種同文同洲之越南國，為法人所蹂躪而不之救乎。³⁵

潘佩珠認為越南與日本同屬漢字文化圈、同屬東亞黃種人，他希望亞洲文明強國的日本基於同文同種同洲之關係能援助越南以抗法。對此，潘佩珠進一步做出總結，他說：

夫主義理而說，則同種之越南國，帝國所當憐恤而保全之。主利害而說，則同洲之越南國，帝國所當而援救之。³⁶

潘佩珠從義理與利害兩個角度來論述日本必須援助越南抗法之原因，從義理來看，日本帝國應當憐恤保全同屬東亞黃種之越南國；從利害來看，在地緣政治上，同屬亞洲的越南國，日本應當援救之，以確保日本的國家利益。潘佩珠以「同文同種同洲」的觀點來寫信給大隈重信，其目的在於希望以情理與利害來說服他，使越南能獲得日本有力之支援以對抗法國。

潘佩珠在 1905 年旅日後，所面臨的日本亞洲主義的氛圍，是在列強協調框架下，以日本的優勢為軸心來實行的亞洲主義，此一做法違背潘佩珠之願望。辛亥革命成功後，1912 年中華民國政府成立，滿清被推翻，這件事情是重大的歷史轉捩點，震驚了潘佩珠，這是他所料想不到的，這一消息令他非常振奮，他認為革命成功之後，中國必繼日本而強盛。若中日二國能同心協力以抗衡歐洲，則越南、印度、菲律賓等國家皆有望獨立。³⁷ 因此，他欲合縱日中兩國，寫了一冊萬言書《聯亞葛言》，其內

Thuận Hóa, 2001; Hà Hội 河內: Trung Tâm Văn Hóa Ngôn Ngữ Đông Tây 東西語言文化中心, 2001), p. 494.

35 同上註，頁 494-495。

36 同上註，頁 495。

37 (越南)潘佩珠，《潘佩珠年表（抄本）》，編號：Vhv.2138，無頁碼。

容強調「極言中日同心之利益，與不同心之損害」。³⁸ 潘佩珠強調，為了解放亞洲國家的自由，日中友好協力合作共同復興亞洲是絕對必要的。³⁹ 潘佩珠在《聯亞葛言》一文中指出了亞洲對全世界負有重大責任，他說：

位亞洲於六大洲而其土地較他諸洲為廣，而其人民較他諸洲為夥，而其出產較他諸洲為富，而其開化較他諸洲為早。此非造物者之獨厚於亞洲也，亞洲固有絕大之責任在也。所謂絕大之責任者，驅全世界而登之於人道和平自由幸福之天是也。⁴⁰

潘佩珠認為亞洲在全世界六大洲之中具有土地、人口、物產、開化時間等優勢，因此亞洲負有導引全世界趨向人道和平自由幸福的重責大任。依潘佩珠視點，亞洲才是全世界的重心，故其主張聯亞洲為一群，進而推廣之，以達致世界一家之境地。他說：

是必有一物焉，其勢力足以進退全世界，而有餘其氣力，足以吞吐全世界而有餘，其慧、能力又足為全世界任一切人道、和平、自由、幸福之媒介而有餘。夫而後聯全世界為一群之責任乃於此一物。將何所託此一物也？其亞細亞洲乎！土地之廣，廣於他諸洲；人民之眾，眾於他諸洲；出產之富，富於他諸洲；開化之早，早於他諸洲。彼其勞力、其氣力、其慧、能力當必裒然為諸洲冠。向吾所謂絕大之責任，縱非亞洲，又將誰託？……欲聯世界為一群，必自聯全亞洲唯一羣起。凡物必有群之性質，凡羣必有聯之資格。彼全亞洲之人種顧自儕於鳥飛獸散而不樂求享和平幸福之一日，豈其情哉？然所以未能聯為一群，則以有物以梗之故也。梗不去，則群不能聯。不能聯，雖以父子、夫妻，尚形離索，何況國界、教界之隙？今欲聯之，非先拔一群之梗則不可。⁴¹

潘佩珠認為亞洲擁有諸多優勢，堪作全世界和平幸福之媒介，惟欲聯合世界必先聯合亞洲，方能達致全世界之幸福，而阻礙亞洲團結之強權（歐洲列強）勢力必須先予以鏟除。潘佩珠的論點有聯亞抗歐的意味，聯合廣土

38 同上註。

39 同上註。

40 牟樹滋，〈讀《聯亞葛言》有感〉，《順天時報》第 3189 號，1912.9.24，第 2 版。

41 同上註。

眾民、物產豐饒的亞洲各民族，能排除歐人對亞洲的殖民及分化，將亞洲聯合成群體。潘佩珠於 1912 年在《聯亞葛言》中提出的聯亞抗歐的觀點與 1905 年潘與大隈重信會談時，大隈所言之「歐亞競勝」觀點有類似之處。所謂「歐亞競勝」就是歐洲各國為一組，亞洲各國及被殖民的各民族為一組進行競爭，最終將一決勝負。而大隈認為當時日本的國力尚為不足，無能力與全歐戰爭，故放棄援助越南、對抗法國的想法。⁴² 這種「歐亞競勝」的觀點應是受西方「黃禍論」⁴³ 的影響所激發出來的，認為歐洲各國會組團共同對抗亞洲黃種各國及民族。他進一步說：

彼西歐人者，東亞人之梗也。印度、緬甸，何辜於英，為英奴囚，乃三百載。越南於法，何仇何債，為法牛馬，亦五十年。至於支那大陸，自葡人竊奧〔澳〕、歐燄漸張，繼而英而法而德而俄，虎噬鷹攫，各逞所慾。

恣彼豺狼，睽我骨肉，馴至同洲同種之人，分崩離析。父不能有其子，兄不能有其弟。迫厥厲首，謂非歐人為之梗歟？此梗一日不除，則亞羣一日不能合。亞羣一日不能合，則全世界之群禍將無已期，而所謂人道、和平、自由、幸福者，畢竟虛偽之名詞，夢幻之空理而已。彼西歐人者，其真傷人道之蠹蟲，壞和平之炭氣，妨自由之箝鎖，摧幸福之斧斤也哉！吾故曰：「欲併全世界為一羣，必先併全亞洲為一羣。欲併全亞洲為一羣，則凡為亞洲之梗之歐人，宜協全力以剷除之乃可耳！」雖然，此說也，其目的在保全世界之平和，而其進行之方針則當何先？此正吾輩所急宜解決之問題也。⁴⁴

這裡潘佩珠呈現出東亞共同體的意識，他認為西歐人是東亞人政治獨立、

42 「（大隈）謂余曰：『以民黨援君等，則可；以兵力援君等，則今非其時。戰國情勢非日法單獨問題，乃歐亞競勝之問題。日欲援貴國，則必與法開戰，日法開戰則全球之戰機皆動。以今日之日本，與全歐爭力尚不足。君等能隱忍以待機會之至乎？』」（越南）潘佩珠，《潘佩珠年表（抄本）》，編號：Vhv.2138，無頁碼。

43 參見楊瑞松，〈爾有黃禍之先兆，爾有種族之勢力：「黃禍」與近代中國國族共同體想像〉，《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臺北：政大出版社，2010），頁 16-67。

44 牟樹滋，〈讀《聯亞葛言》有感〉，《順天時報》第 3190 號，1912.9.25，第 2 版。

國家發展之障礙，他認為要團結世界須先團結亞洲，欲團結亞洲，必須全力剷除歐洲人在亞洲之力量，其目的在於追求世界之和平。羅景文認為，潘佩珠之所以批評歐洲人為和平自由的破壞者，其目的在於激發對歐洲殖民主義的反對，以強化作為歐洲人的「他者」的亞洲之自我認同。⁴⁵

為了達到世界和平，潘佩珠認為聯合全亞洲之力以驅逐歐洲列強為當務之急。而全亞洲中，僅有中日兩國有能力與歐人競爭，他說：

環顧東西，俯仰宇宙，所嶄然為亞洲眉目者，僅有中國與日本之二國。深念大局，逆揣前途。曰亞洲者，亞洲人之亞洲可；即曰亞洲者，白種人之亞洲，亦無不可。統而言之，其禍其福，止有兩途。其一曰：「又數十年或不及數十年，舉全國皆為完全獨立國。」其一曰：「又數十年或不及數十年，舉全亞洲皆為支配於白種人之國。」此兩途者，其樞機在中日二國國民耳。中日而同心，則必入於福之途，而前之說驗；中日而離心，則必入於禍之途，而後之說驗。⁴⁶

潘佩珠預言了亞洲兩種歷史發展的可能性，第一種是數十年以內全亞洲皆脫離殖民地獨立，第二種則是數十年之內全亞洲皆受白人國家所支配，其關鍵取決於中日兩國是否同心協力對抗西方白人國家。但歷史發展的結果是中日離心離德，進而引發長達 14 年（1931 年 9 月 18 日至 1945 年 9 月 2 日）的戰爭，兩敗俱傷，於戰後形成美蘇兩強格局，由美蘇兩大白人強國支配亞洲，亞洲各國雖於戰後名義上陸續脫離西方殖民而獨立，但皆分別納入美蘇兩國的勢力範圍，未能成為完全獨立國，這也是中日戰爭所造成的重大影響。顯然地，歷史發展更接近於潘佩珠所預言的第二種可能性。更進一步，潘佩珠強調亞洲的禍福前途之關鍵取決於中日兩國是否同心合作，中日若不同心，日本亦將被孤立，為歐人之所乘，全亞洲將被歐人主宰而無法獨立自主。他再次強調中日同心之重要性，他說：

中日二邦，唇齒具在。歐人雖鯨貪虎暴，逐逐眈眈，然且忍而未及逞耳。設使中日長此離心，或抱畧中之謀，或懷吞日之策。萬一釁起，

45 羅景文，〈2010 년 이후 中文學界 潘佩珠 연구 성과에 대한 고찰——潘佩珠 관련 조직과 인물의 재중국 활동 양상과 더불어〉，頁 257-356。

46 同上註。

同室操戈，彼從旁垂涎者，必起而慫恿其說，陰助日本，而實行瓜分之謀。瓜分之謀成，均勢之局定，黃禍之說消，而日人遂立於形孤影隻之地，數年之後，歐人從容展布，握有中土全權。……曩時與日同盟之英國有先起而排日矣！日人地瘠民貧，雖雄武善戰，其能與英俄德諸雄相牽持於歲月耶？必不能也。此亞洲危險之隱象，而中日離心之所以為大害也。⁴⁷

潘佩珠認為歐人瓜分亞洲的戰略是先聯合日本，瓜分亞洲。等到亞洲都被瓜分完了之後，日本形單影隻，歐人遂聯合起來對付日本，如此一來亞洲將全被歐人宰制。潘佩珠除強調中日唇齒相依必須同心外，又認為以後世界競爭重點在於人種問題，白種人必定會團結一致以排斥黃種人，並與黃種人作最後決戰，因此黃種人必須團結一致才能避免被白種人宰制。他說：

列強勢均力敵，之後世界競爭之點必趨重於人種問題，亞洲黃種必同擠於白人圈外。歐洲白人必併為一，以與黃人決最後之死戰。黃人散，白人團；黃人離，白人合。工界、商界、學界種種對較，勝負已形，豈待槍礮相臨？而生死存亡之機始現哉！試觀於近十年來歐人之對待華人，與近數年前英領加拿大之對待日人，有遠慮深心者亦可以醒矣！⁴⁸

上面的觀點與黃禍論有關，也與大隈重信的「歐亞競勝」理論有關，潘佩珠認為將來世界競爭的重點是放在人種之間的決戰上。這裡隱含著潘佩珠期望黃種人國家團結起來與西方白人國家進行一場總體戰，以獲得最後勝利的想法。有關聯合亞洲之方針，潘佩珠認為中國當為賢長兄，以領導亞洲，而中國與日本兩國應合作團結整個亞洲，才能收復亞洲各國從歐人失去的權利，進而促進世界和平。他說：

今則中國新政府成立，民氣勃勃，如日初生，對於亞洲，當為賢長兄，而擔任其一切提攜、指導之責，為日本人者，亦必以亞洲全局為重，以將來全世之幸福為重，抑斂曩時驕氣，釋怨棄仇，共圖築利，與中國國民協力同心，分任其提攜東西之責，使黃人之精神愈日愈團固，黃人之勢力愈日愈擴張。不數十年間，二國連襟並進，一犄一角以共挽回已失之舊物。歐人所得於亞洲之權利一旦奉還故主，則凡曩時所

47 牟樹滋，〈讀《聯亞莠言》有感〉，《順天時報》第 3191 號，1912.9.27，第 2 版。

48 同上註。

為亞洲梗者，廓清無存，而全亞洲為一羣之策，可以次第成立。全亞洲既以聯為一羣，則其羣力之澎湃已足以左右全世界而為所欲為，於是盡出其平昔人道和平之宗旨而陶冶全世界，使凡野心侵略家皆不得不俯首降心，而惟我所範。⁴⁹

1905 年日俄戰爭日本戰勝之後，潘佩珠本期待日本領導亞洲，但是日本為了顧及與英法等列強進行國際協調，不願承擔領導亞洲的重任。1912 年中華民國新政府成立後，潘佩珠的觀點隨時勢而轉變，寄希望於中國，轉而期待中國任亞洲長兄之責，領導亞洲。為了促成中日同心合作，潘佩珠欲成立中日同心會，在簡章中有關該會之義務方面，他說：

甲、聯結中日二國人交換智能，互助勢力，振興東亞，培植黃種，以共成將來偉大無窮之事業。

乙、中日二國人任全亞人導師之責，主開導全亞人之智能。

丙、中日二國人任全亞人兄長之責，專扶翼全亞人之勢力。⁵⁰

潘佩珠既把中國視為亞洲的賢長兄，又把中日二國人視為全亞洲人的兄長，這勾畫出潘佩珠的亞洲圖像，即中國為亞洲的大哥，日本為亞洲的二哥，共同合作指導亞洲的繁榮，顯示其有欲以具體行動團結中日二國之意圖。另外，潘佩珠也區分了東亞及全亞之不同概念，這裡講的東亞指的是東亞及東南亞的黃種人⁵¹ 國家（不包括西亞及南亞），具有同種同洲同病之特質，同有遭受西方白人國家殖民之弊病。對東亞越南中國日本等國而言，西亞與南亞則是不同種而同洲同病，故仍是需要加以團結的對象。所以上述甲乙丙三項就有所區分，甲項的振興東亞、發展黃種是針對大東亞（東亞及東南亞）黃種國家而言來加以團結發展的項目，乙丙兩項則是擴及受西方白人國家殖民的全亞洲諸民族來加以協助發展。

這種因為人種而產生的差別也體現在潘佩珠自傳中，潘佩珠說：

先是臺灣諸志士組織一密黨，將樹革命旗於臺灣。其黨魁為楊鎮海，楊曾入臺灣高等醫學校，得醫學文憑，聰明伶俐，通英文，並日文，

49 牟樹滋，〈讀《聯亞芻言》有感〉，《順天時報》第 3192 號，1912.9.28，第 2 版。

50 同上註。

51 黃種人即蒙古人種（Mongoloid）。

又解漢文，富有革命思想。因謀洩被日政府逮捕，楊殺獄卒而逃，至上海，日政府以殺人犯控於華，上海華官不敢容楊。楊乃變姓名至廣東，得讀越南光復會宣言書，與余所著，遂請加入我黨，冒越南籍，竟充光復會委員，以其人有辦事材也。嗟夫！以亡國之黨人，竟包庇其他亡國之黨人，事亦離奇矣！⁵²

臺灣革命志士楊鎮海的例子值得重視，他能冒充越南籍，乃至成為越南光復會委員與臺灣人在人種上與越南人相當接近有關。而臺灣受日本殖民的命運也類似於越南受法國殖民的命運，故楊鎮海在閱讀越南光復會宣言書與潘佩珠的著作後，感到相當認同，而申請加入光復會。而楊精通漢文、日本、英文三種語言也與他接受在日本殖民下的西式教育與臺灣人身份有關，所以日治時代臺灣的知識份子兼具漢文明、日本文明、西方文明三種特質，也容易成為亞洲各國互相聯繫的橋樑，角色相當重要。關於臺灣革命志士楊鎮海的生平事蹟及其思想值得後續進一步研究，以窺其堂奧，更能對十九世紀末至二戰結束前亞洲各國的交流情況做更深入的瞭解。以下再舉印度人為例，潘佩珠說：

余因憶在日本時，余送我國學生四人入振武學校，印度革黨時亦多駐日者，以面貌太與華人殊，不能入軍事學校。黨魁帶君，求援於我黨，願承認為越南人，為之先容於日政府，我黨不敢諾。時廣西陸榮廷為桂軍統領，創辦陸軍幹部學堂，余以書介紹帶君於陸。陸嘉其志，然婉卻之。無內力而倚賴人，其困苦若是。雖然，若我黨者，入北京士官學校，入廣西陸軍學校，入廣東軍官學校，教之、養之、保全之、毫無所吝。華人對我，其感情不已厚乎？⁵³

從這段可以看出人種差異度的重要性，由於越南人種面貌與華人較為近似，故能獲得許可進入日本專為中國陸軍留學生興辦的振武學校。而駐日印度革命黨人因為人種面貌與華人相差太大，故不能進入振武學校。印度革命黨黨魁帶君請求越南維新會援助，希望被承認為越南人，也因為人種差異太大而不被許諾。桂軍統領陸榮廷（1859-1928）對待越南人與印度

52 （越南）潘佩珠，《潘佩珠年表（抄本）》，編號：Vhv.2138，無頁碼。

53 同上註。

人差異很大，陸雖嘉勉印度革命黨黨魁帶君之志向，但卻婉卻其進入軍校；相反地，陸榮廷乃至其他華人對待越南人的感情則是非常深厚的，讓越南人進入各地軍校接受訓練及用心培育，這也體現了當時的華人對越南人有著同文同種的兄弟國之情感，以及昔日中國與越南主藩舊關係之情感延續。⁵⁴ 這種觀點也是潘佩珠在 1912 年《聯亞葛言》文中的中日同心會簡章中所區分之東亞與全亞的概念之不同。中國、日本、越南、朝鮮、臺灣等是在東亞的範圍內，印度則在全亞而不在東亞的範圍內。

關於亞洲主義與潘佩珠的關係，日本學者白石昌也（1947-?）從「同文同種同洲」、一元的文明進步史觀、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角度來分析。⁵⁵ 一方面，潘佩珠認為越南與中國、日本為「同文同種同洲」之國，以「黃種新進之國」來稱呼日本。⁵⁶ 潘佩珠「同文同種同洲」的提法也表現出其期望以越中日三國的親緣關係攏絡中日兩國的士人來援助越南抗法革命運動。在給兩廣總督岑春煊（1861-1933）的書信中，潘佩珠一方面強調中越間的地理、歷史、文化的關係之親密性；另一方面，放在最近的國際關係中指出立場與利害之共通性。指出共通的外敵的存在。⁵⁷ 前面強調同文同種同洲之兩國親密性，後面強調國家利害，期待中越共同對抗法國。〈潘佩珠年表〉、〈獄中書〉、〈上粵督岑大人春煊書〉之中皆指出中越兩國「唇齒的關係」及「累朝主藩」（宗主國與屬國的關係）這兩點，⁵⁸ 以此拉近中越兩國的距離，意圖動之以情，感動岑春煊總督的援越之心。而 1905 年潘佩珠寫給大隈重信的書信中也展開「同文同種同洲」之議論，潘佩珠抱持著「同種之情與東亞保全之義」，從「義理」面言之，越南是同種之

54 潘佩珠在其自傳中記載中國日報馮自由主任提及「主藩舊關係」一語。馮謂余（潘佩珠）曰：「迨之十年後，吾黨排滿成功，始能為貴國援手，今日尚非其時。但以主藩舊關係，則求之滿政府中人，亦未必全無補益。現粵督岑春煊，滿臣而漢人也，且彼為桂籍人，與粵唇齒，君往懇彼，或得一臂。」見（越南）潘佩珠，《潘佩珠年表（抄本）》，編號：Vhv.2138，無頁碼。

55 （日）白石昌也，《ベトナム民族運動と日本・アジア——ファン・ボイ・チャウの革命思想と対外認識》（東京：巖南堂書店，1993），頁 354-398。

56 同上註，頁 356。

57 同上註，頁 358。

58 同上註，頁 367，註 6。

國，日本應以愛護同種之情保全越南；從「利害」面言之，越南是同洲之國，日本應救援幫助越南。⁵⁹

潘佩珠 1905 年出洋去日本的目的是期待獲得日本軍事及武器的援助。然而 1907 年 6 月日法協約締結以後，外交情勢大變，日本與法國進行採取國際協調政策，日本無視「同文同種同洲」的越南民族的利害，與對越南民族壓迫的法國攜手合作，承認了法國對越南的殖民，不支持越南抗法，日本政府直接干涉東遊運動，使東遊運動最終於 1909 年瓦解，這些令潘佩珠產生很大的衝擊，他對日本感到失望與不信任，他的對日觀因而產生變化，從聯合「同文」的東亞漢字文化圈的日本，轉而志在連攜亞洲「同病」之諸民族、全亞諸亡國的志士。⁶⁰ 換言之，超越「同文」的漢字文化圈之界限，轉而擴大為攜手聯合亞洲「同病」的諸民族全體。⁶¹ 相對於潘佩珠，孫中山則在潘佩珠離開日本之後的 1913 年於東京的演講內容中仍然強調「同文同種同洲」的觀點。⁶²

白石昌也分析了亞洲主義與福澤諭吉（1835-1901）脫亞論之差異。在亞洲主義的體系下，日本與歐洲列強之間不但有人種上與文化上的相異，而且歐洲列強也強迫日本簽訂了不平等條約，歐洲列強把亞洲各國當作殖民地加以支配，並且歐洲人與亞洲人之間有人種上、文化上的相異。反之，日本與亞洲各國則具有人種、文化上的親近性與地理的鄰近性，以及歷史體驗的共通性。福澤諭吉的「脫亞論」（1885 年 3 月 16 日提出）

59 同上註，頁 358-359。

60 同上註，頁 410-415、464、477、485、488。

61 同上註，頁 488。

62 孫中山於 1913 年 2 月 23 日在東京對留學生的演講內容中說：「現今五洲大勢，澳非兩洲，均受白人之箝制。亞洲大局維持之責任，應在我輩黃人。日本與中國唇齒之邦，同種同文，對於亞東大局維持之計畫，必能輔助進行。縱有些小齟齬，亦須顧全大局，不能成一問題。亞洲人口，占地球三分之二，今日一部分屈伏於歐人勢力範圍之下。假使中日兩國協力進行，則勢力膨脹，不難造成一大亞洲，恢復以前光榮之歷史。令世界有和平，令人類有大同，各有平等自由之權利。世界幸福，都是黃種五萬萬人造成的。」參見孫中山，〈學生須以革命精神努力學問（民國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在東京對留學生全體演講）〉，收入《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全集》第 3 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頁 144-145。

認為日本應該脫亞，與歐洲列強並駕齊驅，同列於文明國之林，發展近代化，與歐洲列強共同對外開化的亞洲殖民地進行支配。亞洲主義之其中一個理論是大隈重信的「支那保全論」，支那保全論可以說是「東洋門羅主義」，把中國乃至東洋視為日本的勢力範圍，拒絕歐洲列強對中國的分割，保全中國，以「同文同種同洲」合理化日本對中國的經營。福澤所代表的「脫亞論」與大隈所代表的「支那保全論」兩者差異不大，前者是日本富強論，後者是亞洲經營論。唯一的差異在於，大隈所代表的「支那保全論」採取亞洲主義的「同文同種同洲」的立場，這點是「脫亞論」所沒有的。⁶³ 不論是脫亞論或大隈重信的「支那保全論」都是日本對亞洲的殖民擴張與支配，只是其中的立場稍有不同而已，日本的這些觀點都是潘佩珠所反對且對日本失望之處。

亞洲主義的內涵皆強調同文同種同洲，不論日本的曾根俊虎及大隈重信、中國的孫中山、越南的潘佩珠等人皆然，惟潘佩珠並不贊同日本學者大隈重信「支那保全論」與福澤諭吉「脫亞論」的殖民觀點。越中兩國除了同文同種之外，中越兩國人民有著更為親近的同祖之觀念，下一節將進一步論述潘佩珠的中越同祖觀。

三、中越同祖觀

潘佩珠回顧明朝統治越南期間，越南人抗明的戰爭與民族精神，是為了希望越南人能效法祖先的抗爭精神以激發越南人民的抗法鬥志，讓越南能澈底擺脫法國的殖民統治，獲得國家的獨立自主。《重光心史》⁶⁴ 是潘佩珠在龍濟光獄中的作品，《後陳逸史》則是《重光心史》的越南抄本，兩者雖然為同一部小說，但由於發表場域的不同（《後陳逸史》為抄本，《重光心史》發表於中國《兵事雜誌》），使兩者在內容有些顯著不同。⁶⁵

63 （日）白石昌也，《ベトナム民族運動と日本・アジア——ファン・ボイ・チャウの革命思想と対外認識》，頁 399-408。

64 （越南）潘佩珠，《重光心史》，收入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 2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 275-360。

65 根據羅景文的觀察：「《後陳逸史》是潘佩珠借明朝張輔率兵攻佔安南，而陳季擴與阮

進入越南語境時，潘佩珠強調越南主體性、去中國化，故不稱黃帝子孫；進入中國語境時，為了強化中越關係、拉攏中國、爭取中國人支持越南人抗法，而強調中越同祖觀、去越南化，因此稱黃帝子孫，中越為同祖兩國的關係。雖然潘佩珠為了適應發表場域以及爭取中國讀者的支持，而策略性地抽換字詞與內容，但潘佩珠確實也具有中越同祖觀，如潘佩珠在其自傳《潘佩珠年表》中說：「余想現時列強情勢，非同文同種之邦，誰肯助我者？中朝已讓我越與法，況今國勢衰弱，自救不暇。惟日本惟黃種新進之國，戰俄而勝，野心方張，往以利害說之，彼必樂為我助。」⁶⁶ 潘佩珠這裡提到中國（中朝）與日本皆為越南之同文同種之邦，這裡也證明了潘佩珠具有中越同祖觀。

在《後陳逸史》序中潘佩珠道出中越同祖的觀點，他說：

夫我祖先高曾之事，其關係於我何等密切，我同胞必樂聞之。農者息耒，工者寢器，商者閑肆，士者憩籍，暫拋擲其至貴之一刻光陰，以俟予小子畢其詞。知我同胞決不嫌厭，何也？人一道及祖先高曾，當無不傾耳而願聞者，此吾人類同具之良心；苟非是，則人形而畜性也。豈有天帝子孫、聖神苗裔之我同胞、我國民，而竟若是者？⁶⁷

潘佩珠此段描述旨在激發國民的抗法精神，此文中「豈有天帝、聖神苗裔之我同胞、我國民，而竟若是者？」之句在《重光心史》的版本中則是「豈有黃帝子孫、聖神苗裔之我同胞、我國民，而竟若是者？」⁶⁸ 代表潘佩珠認為越南與中國同屬黃帝子孫，具有相同的血脈傳承。

熾、阮堅等士組織義軍抵抗明軍的故事來鼓舞人民抗法，因此小說中多有貶抑中國之語，如稱明軍為『吳賊』、『吳狗』或『吳戎』，文中人名和地名也照實描述。但為了顧及發表場域（中國）與讀者，發表在《兵事雜誌》上的《重光心史》已經大幅刪去對明朝的貶抑之詞，模糊了對黎阮兩朝的描述，人名與地方也多作修改，如『順化』便換以『歸順』、『南平』、『韶城』與『京城』等名稱。《兵事雜誌》上的《重光心史》較越南抄本《後陳逸史》有『去越南化』的傾向，也削弱了原本國族論述的力道。」轉引自羅景文，「潘佩珠及漢文小說之研究」，頁 111-112，註 59。

66 （越南）潘佩珠，《潘佩珠年表（抄本）》，編號：Vhv.2138，無頁碼。

67 （越南）潘佩珠，《後陳逸史》，收入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 20 冊，〈序〉，頁 366。

68 （越南）潘佩珠，《重光心史》，〈序〉，頁 281。

在越南淪為法國的保護國，受到法國殖民統治之後，潘佩珠開始積極從事復國運動，在 1905 年 12 月 31 日他書寫〈上南粵鎮總兵劉淵亭軍門永福祈為介紹於粵城人士書〉⁶⁹一信請求清朝劉永福（1837-1917）將軍幫助越南抗法革命並介紹廣東人士與潘佩珠互相認識，信中說到：

嗚呼！我黃帝數千年以來之人種於歷史上之關係者，孰若我中國之與敝國越南哉？我中國之與敝國越南其為千年以來歷史之父子兄弟之情誼，又孰若我中國貴省廣東之與敝國哉？天乎！天乎！海桑沉陸。父不能有其子，兄不能有其弟，使狼面獸心、鬚鬚灰眼之佛蘭西者，得於此同種同胞之國，魚肉而饕啗之，此誠敝國之苦辱也，而亦豈貴國之榮且樂哉？⁷⁰

潘佩珠在 1905 年的農曆八月上旬即已抵達廣東，拜訪劉永福，潘佩珠對於劉永福抗法的英雄之行，為之崇拜與傾倒。⁷¹潘佩珠在給劉永福的信中說到「我黃帝」，表現出潘佩珠一再強調越南與中國同為黃帝子孫，屬於同祖先的同人種關係。稱中國為「我中國」，稱越南為「敝國越南」，其中更充滿著中國情懷。不僅在血緣上認同中越同祖，在文化上既認同本國越南，也認同中國，所以稱「我中國」。他將中國與越南的關係視為如同父子關係或兄弟關係般的親密。潘佩珠寫作此信是以中越兩國之間的共通性之事實為基礎來拉攏劉永福，意圖使其能以軍事大力支援越南的抗法革命運動。關於中越兄弟觀的部分，在下一節進行討論。

在潘佩珠的思想中，中越兩國具有共同的祖先，具有血緣上的同源性。在文化上，越南也具有高度的漢文化意識，在潘佩珠的〈自語〉一詩

69 光緒乙巳年十二月初六日書，即 1905 年 12 月 31 日。

70 Phan Bội Châu, “Thượng Nam Việt trấn tổng binh Lưu Uyên Đình quân môn Vĩnh Phúc Kì vì giới thiệu ư Việt thành nhân sĩ thư 上南粵鎮總兵劉淵亭軍門永福祈為介紹於粵城人士書,” in Chương Thân, ed., *Phan Bội Châu Toàn Tập*, tập 2, p. 492.

71 潘佩珠在其自傳中提到拜訪劉永福的情形，他寫道：「（1905 年）八月上旬抵廣東，訪劉永福，因謁前三宣贊理阮述。劉年已七旬，而貌尚矍鑠，語及西洋人，則拍案曰：『打、打、打。』余因憶法兵兩次取河城，使無劉團，則我人無一滴血洗敵人頸者。噫！彼不可謂雄乎哉！余此時崇拜英雄之心，不覺歸劉傾倒。」見〈越南〉潘佩珠，《潘佩珠年表（抄本）》，編號：Vhv.2138，無頁碼。

文中表現出來，其詩云：

君不見，長安宮外胡笳吹，斷腸一曲凝愁思；
君不見，昇龍城上胡馬馳，塵埃滿眼捲天飛。⁷²

此段詩文感嘆法國殖民統治越南的情況，他以長安宮指稱越南順化皇城，「胡」代指法國，具有漢文化意識。詩又云：

君不見，文武衣冠異昔時，漢宮無計覩威儀。⁷³

越南自從法國統治後，傳統服裝就改變了。這裡的「漢」指的是越南，從此可以看出潘佩珠的思漢情懷，並將越南自居為漢。潘佩珠在兩首〈哀越南〉的詩中也顯露中強烈地漢文化意識，其一云：

闌珠神弩消沉久，路易鷹刀宰割驕，
嘉種已成秭稗賤，此中多是漢家苗。⁷⁴

〈哀越南〉之二又云：

漢唐遺制衣冠在，虞虢相憐涕淚多，
此地我來方是主，扣關稱客痛如何。⁷⁵

潘佩珠一方面哀嘆越南淪為法國武力佔據下的殖民統治所宰割，一方面也認為越南的人種是優秀的，且很多人是漢人的苗裔。第二首詩中潘佩珠透露出越南淪為殖民統治的悲哀，但這時順化皇城中阮氏朝廷仍然行禮如儀，保持漢唐遺制之衣冠，這裡也流露出越南的漢唐文化之傳承，也體現出潘佩珠的漢文化認同。

在人種方面，潘佩珠斷定越南人就是漢人、華人，他說：

我今日人種可斷然為漢人之種。夫雕題⁷⁶交趾之蠻種一變而為衣冠秀

72 Phan Bội Châu, “自語,” *Phan Bội Châu Toàn Tập*, in Chương Thâu, ed., tập 1 第 1 冊, p. 366.

73 同上註。

74 Phan Bội Châu, “Ai Việt Nam 哀越南,” in Chương Thâu, ed., *Phan Bội Châu Toàn Tập*, tập 2, p. 546.

75 同上註。

76 雕題為古代交趾的文身習俗。《禮記·王制》曰：「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

雅之華種，雖我古人之不幸，然我後人之幸也。凡我子孫其忍令此種消磨沈屈與牛馬蠻耶？⁷⁷

潘佩珠認為越南人是漢人之種，所以他別名為潘是漢，即在文化上認同漢文化，認為自己是漢人。他在人種和文化上皆認為越南人是漢人，具有高度的漢文化意識，甚至把中越關係定位為兄弟關係。

潘佩珠同時具有兩種觀察角度，一者是站在越南史臣、歷史家的角度，二者是站在使者的角度、外交家的角度。依照不同的時機脈絡，在展現越南本國立場時，潘佩珠會展現越南史臣、歷史家的角度來寫作，突顯越南的主體性；而在與中國人交流時，則會展現其使者的角度、外交家的角度，自我華裝，強調中華性。⁷⁸ 潘佩珠在強調越南本國立場時也有「各華其華」的傾向，潘佩珠所謂的「漢」是指漢文化，漢文化是超越越南、中國、朝鮮、臺灣之上的概念，換言之，漢文化的涵蓋範圍包括越南、中國、朝鮮、臺灣。潘佩珠所謂的「漢」不是指中國獨佔之漢，而是用以代表越南自身的文化優越性與民族主體意識。

潘佩珠認為中越同屬黃帝子孫，不僅在血緣上認同中越同祖，在文化上亦認同中國，自己具有高度的漢文化意識。

四、中越兄弟觀

潘佩珠把中國與越南的關係定位為兄弟關係，在上一節所述的潘佩珠的信中已經表達出來。潘佩珠在日本時與梁啟超有著密切的聯繫，他曾與

矣。」參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0），卷 5〈王制〉，頁 247。鄭玄《禮記注》曰：「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孔穎達《禮記正義》疏曰：「雕題交趾者，雕，謂刻也；題，謂額也。謂以丹青雕刻其額，非惟雕額，亦文身也。」參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5〈王制〉，頁 247-248。

77 Phan Bội Châu, “Việt Nam Quốc Sử Khảo 越南國史考,” in Chương Thâu, ed., *Phan Bội Châu Toàn Tập*, tập 3 第 3 冊, p. 434.

78 張崑將，〈越南「史臣」與「使臣」對「中國」意識的分歧比較〉，《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12.1(2015.6): 186。

梁啟超見面，其目的在於請教他關於如何脫離法國殖民與越南之復興，並期盼透過他的相助，與日本政界建立友好關係以獲得外交支持與軍事援助。雖然其能得到梁啟超許多協助與建議，得以建立與日本政界如大隈重信、犬養毅等人脈，但最後潘佩珠仍未能獲得日本政界之支持承諾。⁷⁹ 另外，1905 年在日本橫濱時，潘佩珠因梁啟超之關係透過犬養毅而認識孫中山。潘、孫兩人曾兩度在致和堂會見，每次會見都筆談二、三小時。⁸⁰ 筆談中，孫中山痛斥君主立憲的虛偽性，並相互討論中越兩國革命相互支援的可能性。⁸¹ 潘佩珠在與梁啟超晤談時，梁建議潘佩珠把重點放在教育和喚醒自己的人民面對現代世界的多重挑戰，他建議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成果。梁啟超警告不要讓日本軍隊進入越南，而是建議他與日本政府建立關係，使得越南最終獲得獨立之時，日本成為越南獲得外交承認的最大強權。這個想法不是試圖通過外援來獲得獨立，而是要使所有越南人都有所準備，以待適當的機會（例如，法國和德國之間起衝突）來爭取獨立。另外，武器方面，到時候中國可以由廣東和廣西供應，支援越南抗法獨立。⁸² 從上述潘佩珠與孫中山、梁啟超的接觸來往展現出中越間的兄弟情誼。

惟潘佩珠也曾表露出對中國援助越南的期待與失望，他說：

堂堂大中華，一羽不能庇。⁸³

相對地，潘佩珠也講到日本與越南的關係，他說：

彼日本國，一亞洲之同種國矣！而且見敝國亡，人必垂淚而道白人之虐，勸之以逃難遊學，慰之以機會將來。恤患分憂，彼其數千里重洋

79 羅景文，〈東亞漢文化知識圈的流動與互動——以梁啟超與潘佩珠對西方思想家與日本維新人物的書寫為例〉，《臺大歷史學報》48(2011.12): 51-96。

80 徐善福，〈潘佩珠研究（上）〉，《暨南大學學報》1980.3(1980.9): 34-45。

81 于向東、梁茂華，〈歷史上中越兩國人士的交流方式——筆談〉，《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3.4(2013.12): 108-116。

82 David G. Marr, *Vietnamese Anticolonialism 1885-1925*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 109. 及參見（越南）潘佩珠，〈潘佩珠年表（抄本）〉，編號：Vhv.2138，無頁碼。

83 （越南）潘佩珠，〈潘佩珠年表（抄本）〉，編號：Vhv.2138，無頁碼。

之外者，尚如是也。強有力之立於其側者，胡為不一舉手哉？⁸⁴

對於日本，潘佩珠用「彼日本國」來稱呼日本，相對於用「我中國」來稱呼中國，顯然在他的心目中，對越南來說，中國比日本更為親近。另外一方面，日本對越南而言也是亞洲同種國，這也流露出東亞文化圈的意涵，日本人對於越南的淪亡也表達出熱切的同情心。

傳統越南的二重朝貢體制⁸⁵影響到潘佩珠設想越南推翻法國統治之後的國際秩序。他期望到時候的世界局面是：

內治之資格由我陶鑄，外交之權利由我抱持，文明事業愈日愈進步，勢力範圍愈日愈擴張。……日、美、德、英皆結我越南為優等同盟國，暹羅、印度及南洋諸島國，皆奉我越南為主盟。亞洲最大國若支那者，則為我越南之親密兄弟國。舊仇國之法蘭西……惟願受保護於我越南。⁸⁶

潘佩珠對越南的國家願景是希望越南能與日美德英等先進國並列，成為列強之一，並與之同盟。他認為亞洲最大國中國則與越南成為兄弟之邦，而其餘的周邊國家（如：暹羅、印度、南洋諸島國等）皆由越南主導並與之結盟。這樣的思維模式與傳統越南的二重朝貢體制有相似之處。至於法國，潘佩珠希望未來能角色互換，反使法國變成受越南保護。

不僅潘佩珠把中越關係定位為親密的兄弟關係，梁啟超亦然，他說：

豈有兄坐視其弟之死，而不救之乎？⁸⁷

梁啟超認為身為兄長的中國應該救援弟弟越南。潘佩珠甚至提出以中國為全亞洲之兄長，扶植亞洲諸弱小國。1912 年 8 月潘佩珠在華人蘇少樓（生

84 Phan Bội Châu, “Thượng Nam Việt trấn tổng binh Lưu Uyên Đình quân môn Vĩnh Phúc Kỳ vì giới thiệu ư Việt thành nhân sĩ thư 上南粵鎮總兵劉淵亭軍門永福祈為介紹於粵城人士書,” in Chương Thâu, ed., *Phan Bội Châu Toàn Tập*, tập 2, pp. 492-493.

85 傳統越南的二重朝貢體制就是越南對中國朝貢、越南也要求其他周邊國家（如：占婆）朝貢的體制。參見（日）桃木至朗，《中世大越國家の成立と変容》（吹田：大阪大學出版會，2011），頁 191-193。

86 Phan Bội Châu, “Tân Việt Nam 新越南,” in Chương Thâu, ed., *Phan Bội Châu Toàn Tập*, tập 2, p. 437.

87 （越南）潘佩珠，《潘佩珠年表（抄本）》，編號：Vhv.2138，無頁碼。

卒年不詳)、鄧警亞(1890-1973)等人的協助下,成立「振華興亞會」,鄧警亞任會長,潘佩珠任副會長,蘇少樓任總幹事。⁸⁸他在「振華興亞會」宣言書中說:

中華地大、物博、人眾甲於全亞洲,又為東方文化最古之國,當為全亞洲之兄長,決無可疑。欲舉全亞洲兄長之責,當以扶植亞洲諸弱小國為獨一無二之天職。(不能如滿清時期般廢棄兄長之天職。)……中華國恥全在於外交不振,而外交不振之故,由於國威不揚。欲揚國威,除對外排歐更無他策,而排歐之手續,惟排法援越為師出有名。⁸⁹

潘佩珠以中國的幅員、人口皆冠於亞洲,且為東方文化最古之國,所以推舉中國為亞洲的兄長,擔當起領導亞洲的重責大任,而具體行動上,他主張中國應援助越南驅除法國勢力。此段文再度顯示其亞洲主義的論點。

關於越南在地理、歷史、人種、文化各方面與中華之間的關係,他說:

吾儕固人類也,且在亞洲民族中與中華並古。地理也、歷史也、人種也、文化也,無一不與中華密接。⁹⁰

潘佩珠認為,越南是亞洲的文明古國,與中國並列為亞洲歷史最悠久的國家,而且在地理、歷史、人種、文化等各方面都跟中國有緊密的關係,具有高度的相關性。他不僅認為中越關係是兄弟之邦的關係,而且也認為中國是全亞洲的兄長,應該擔當起領導亞洲的重責大任。可見潘佩珠的思想受到梁啟超的影響,梁啟超也曾評論道:

亞洲者,全地球之宗主也;中國者,亞洲之宗主也。⁹¹

梁啟超和潘佩珠皆認為中國應該擔當領導亞洲的重任,梁啟超甚至認為中國應擔任全球的領導者。

1907年農曆七月,中華革命黨之中國同盟會,勢力驟增,其機關之

88 鄧警亞,〈中越革命志士組織「振華興亞會」,進行抗法鬥爭回憶〉,《廣東文史資料》22(1978.11): 205-219。轉引自羅景文,「潘佩珠及漢文小說之研究」,頁27。

89 (越南)潘佩珠,《潘佩珠年表(抄本)》,編號:Vhv.2138,無頁碼。

90 Phan Bội Châu, “Thiên Hò! Đế Hò! 天乎帝乎,” in Chương Thâu, ed., *Phan Bội Châu Toàn Tập*, tập 5 第5冊, p. 584.

91 梁啟超,《飲冰室全集》(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69),頁652。

報館發起於東京者，有數十種。其中《雲南雜誌》專為雲南黨人之機關報。由於越南與雲南之地緣親近關係，潘佩珠念及將來必有由滇回越之一日，欲預為聯絡雲南人士之感情，乃自薦於該社主任，並投書〈哀越吊滇〉及〈越亡慘狀〉等作。因此，雲南革命學生對越南維新會（Duy Tân hội）感情甚好。⁹² 潘佩珠認為在地理、歷史、人種、文化等各方面越南皆與中國有緊密的關係，而在中國各省中，雲南、兩粵（廣東、廣西）與越南的關係最特殊，而其中雲南的種族感情與越南更深。且在地理上，越南的兩大河川湄公河、紅河皆發源於雲南。⁹³ 在人種上，雲南人有幾波移民越南，第一波是元朝派烏馬兒（?-1289）、唆都（?-1285）等將領驅雲南兵入侵越南，第二波是明朝永樂年間，明將沐晟（1368-1439）從雲南入侵越南，明朝併吞越南後，將兩廣、雲南民眾移民至越南，經過五六百年來，約有八九成越南人被同化為漢人。而以前越南之原住民交趾種經過幾百年漢化之後，僅剩下人口的極少數而已。所以潘佩珠認為越南大都市居民很多是漢族血脈、黃帝子孫之人種。⁹⁴ 他說：

自漢族僑越太多，以其智巧之性質，壓貉族而勝之。娶妻育子，日愈蕃盛。至明清間，已全化為漢種。而向時交趾種，僅國中萬分之一之最少數。……吾舉通都大邑之軒眉豁面者，夫孰非黃漢血脈之一種也哉，此千年來吾族之歷史也。⁹⁵

潘佩珠對雲南的感情很深，甚至說道：

滇人滇人，吾兄弟國也。⁹⁶

潘佩珠認為越南人與雲南人有著兄弟般的親近，唇齒相依，榮辱與共。他說：

我越之大河二，一為湄公河，一為紅河，其源皆自雲南發。高平興化

92 （越南）潘佩珠，《潘佩珠年表（抄本）》，編號：Vhv.2138，無頁碼。

93 Phan Bội Châu, “Ai Việt Điều Diên 哀越吊滇,” in Chương Thân, ed., *Phan Bội Châu Toàn Tập*, tập 2, p. 528.

94 同上註，頁 526-527。

95 同上註，頁 527。

96 同上註，頁 529。

一帶，高山大林，經老撾繞東京安南，以達極南邊界，又皆自雲南而下險固聯絡，有輔車相依之形。……蓋其藩籬庭戶，犄角東西，存固同之，亡亦相續，於兵家形勢上，有絕重大之要點者。⁹⁷

雲南除了在血緣人種上與越南有緊密的關聯，在地緣政治、戰略上也一衣帶水、唇齒相依。因此，雲南對越南的獨立復國有著非常關鍵的位置與角色。潘佩珠寫這篇文章也有拉近越南與雲南之距離，以尋求雲南人之援助，意圖聯合雲南人與越南人一同對抗法國。1908年農曆十月是分水嶺，當時日本政府為了與法國取得國際協調，而解散越南學生。從1905年至1908年農曆十月，潘佩珠重點在於依靠日本幫助越南革命抗法，以後潘佩珠把重點放在中華革命以及全世界與越南一樣被殖民統治的民族上面。⁹⁸因此1908年農曆十月潘佩珠聯合中國、日本、朝鮮、印度、菲律賓、越南等國志士組成「東亞同盟會」，之後潘佩珠又念及越南與中華之唇齒密切關係，以及兩粵滇桂與越南之地緣近接之關係，而奔走於滇粵留日學生之間，謀創滇桂粵越聯盟會。⁹⁹

潘佩珠認定中越是兄弟之國，在種族文化上具有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¹⁰⁰潘佩珠把中國與越南定位為「兄弟之邦」，一方面期待中國領導亞洲，另一方面期待越南能領導東南亞與印度等國，以期完成越南的復興、亞洲的復興。雖然潘佩珠認為越南與中國在血緣、文化、歷史、地理等各方面關係非常親密，但是他仍然強調越南自身的主體意識，下一節將詳細探討。

五、獨立於中華的越南政治主體意識

97 同上註，頁528。

98（越南）潘佩珠，《潘佩珠年表（抄本）》，編號：Vhv.2138，無頁碼。

99 同上註。

100 家族相似性是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在《哲學研究》一書中提出的重要概念，他舉遊戲為例，棋盤遊戲、紙牌遊戲、球類遊戲、奧運會等遊戲雖然在功能、技巧、構造、特徵等方面有所不同，卻如家族成員那樣，有其相似之處，同屬一個家族。參見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Oxford: Blackwell, 1963), pp. 31-32.

潘佩珠呼請越南歷史上的英雄，包括越人始祖雄王（Hùng Vương）、帶領越南脫離中國的君王及反抗中國侵略的人士等，以建構完整的英雄系譜來強化越南的主體意識。英雄作為凝聚民族自信的載體，以推動越南近代民族國家獨立建國之成功。¹⁰¹

從潘佩珠的思想來看，越南雖然有強烈的漢文化意識，這是在文化上認同漢文化，但是在政治上，潘佩珠有強烈的越南主體意識。他說：

數千年甘內屬於漢唐宋元明、稱臣稱奴、寂無人氣。¹⁰²

潘佩珠對於越南在歷史上做中國藩屬國是採取否定的態度，認為喪失主體性也失去了民氣。潘佩珠對於越南古代稱臣於中國頗不以為然，他說：

然對於北朝外國則初僅稱酋長乃至稱頭目，幾次請求，費無已之朝貢乃得稱國王，臣名某，榮斯極矣！¹⁰³

潘佩珠認為古代越南與中國的關係是南北朝的關係。相對來說，潘佩珠較讚賞古代日本對中國的外交態度，他說：

日本古時，國不大於我，人不眾於我，物產才貨之饒百不及我一，然國皇遺書於隋唐則曰：「日出處天子敬問日入處天子安好」。嗚呼！彼何等尊貴此何等卑賤。對舉相形已堪痛哭。況更復有甚於此乎。¹⁰⁴

潘佩珠認為古代日本不比越南大，人口不比越南多，物產也不比越南富饒，然而在外交上日本卻能與中國維持平起平坐的關係，甚至言詞上還略高於中國（日出天子在語意上地位高於日入天子），顯得很尊貴；反觀越南對中國稱臣朝貢的情況，潘佩珠對於國家對中國的外交感到屈辱，也認為越南臣事於北朝（中國）是無濟於事的，認為事大主義是無用的。¹⁰⁵ 他

101 羅景文，〈召喚與凝聚——越南潘佩珠建構的英雄系譜與國族論述〉，《成大中文學報》37(2012.6): 159-186。

102 Phan Bội Châu, “Tân Việt Nam 新越南,” in Chương Thâu, ed., *Phan Bội Châu Toàn Tập*, tập 2, pp. 436-437.

103 Phan Bội Châu, “Việt Nam Quốc Sử Khảo 越南國史考,” in Chương Thâu, ed., *Phan Bội Châu Toàn Tập*, tập 3, p. 452.

104 同上註，頁 453。

105 同上註，頁 505-506。

說：

丁事宋非不恭也，黎篡丁則宋封黎。黎事宋非不恭也，李易黎則宋封李。最可恨也胡之於陳，莫之於黎，明明然為篡穢賊乃一則借立陳後之為名，因而下併吞之毒；一則貪六峒二州之路，遂亦封莫如黎。……我朝事清甚忠且敬，洋人一嚇即承認我為法保護國。千百年事大稱之結果如是信乎！倚人者之不若自強也。蓋自強者則其氣壯，氣壯則轉弱為強，倚人者則其氣痿，氣痿則化強為弱。使我國於五十年前絕一切事大之思想，培一切強立之基礎，發憤為雄，與物爭勝，國未有今日也！¹⁰⁶

潘佩珠認為越南的丁、黎、李、阮等各朝代皆恭敬事奉北朝中國，但中國並不因此盡好保護的責任，朝代滅亡後，中國皆承認新的既成事實，因此事大主義是毫無用處的。倘若越南先前能發憤自強，擺脫事大主義的依賴心態，讓國家士氣旺盛，越南當時就不會陷入法國殖民統治，失去獨立自主了。

潘佩珠有很強的越南政治主體意識，他說：

日本武士道為我中國希罕之物。¹⁰⁷

潘佩珠甚至用「中國」來稱呼越南，這不但彰顯出越南主體意識，也充分體現出「中國」之多元性。

潘佩珠描述越南抗明歷史以強調越南之主體性，他說：

我國陳朝之季，閩胡失正，吳賊蟠踞我國，十有餘年。我自由之土地人民，大為他族所蹂躪。時我先人父子兄弟困處於牛馬奴隸之獄。其所嘗之病苦，所被之屈辱，比我之今日有十倍焉。然乃蓄志發憤，殲仇雪恥，驅逐吳賊，恢復我固有之主人權，以留遺我後，至于阮朝咸宜元年而終。¹⁰⁸

潘佩珠認為胡季犛篡陳所建立的胡朝是閩統，而失去正統的地位。吳是指中國明朝，因為朱元璋建立明朝前曾稱吳王，故以吳代指明朝。越南人一

106 同上註，頁 506。

107 同上註，頁 493。

108（越南）潘佩珠，《後陳逸史》，〈序〉，頁 366。

向把春秋戰國時期的越國視為他們祖先的國家，越王句踐復國打敗吳國的歷史，似乎在與明朝的戰爭中重演，越南人打敗明朝後，撰寫了著名的《平吳大誥》，¹⁰⁹ 再度宣告吳國（明朝）的失敗與越南的復國。他認為那時祖先被明朝統治比如今被法國統治還痛苦很多倍，但是卻能發憤雪恥驅逐明朝統治，恢復主權，這是當時的越南人民必須效法的。至於國家的獨立復興主要是靠英雄一人之力抑或靠國家眾人之力呢？他說：

迄今讀《平吳大誥》，披故黎史書，猶覺草木皆靈，山河動色。噫！何盛也，我祖先高曾之偉赫何如也！孰能此者？孰不曰黎太祖高皇帝黎利乎？顧予小子聞之：一國所固有之主人權，去矣而復回，失矣而復收，非一手一足之為烈也。黎利者，一鼎鼎有名之大英雄耳。非有億千萬無名之英雄，以相與挽於前、推於後、提乎左、挈乎右，則此一鼎鼎有名之大英雄亦於何以表現？閱乎吳復南故乘，想見我祖先高曾之誕於其時，固無一人而不英雄也者。英雄之真種，英雄之後身，實惟我輩，我烏得而忘諸？我同胞，我國民，起！起！起！聽予小子談故事。¹¹⁰

《平吳大誥》可說是越南脫離明代中國的獨立宣言，潘佩珠看到了越南祖先精神的偉大。傳統上越南人多強調黎太祖黎利（1385-1433）的功業。但是潘佩珠更強調了黎利之所以能成功，靠的就是千千萬萬越南的無名英雄前仆後繼，群體力量的支持，方能成就越南獨立的偉大功業。而現在的越南人皆是偉大越南祖先的後代、後身，這樣的說法旨在激起越南人民抗法的自信心，每位越南人皆能成為國家英雄。

109 《平吳大誥》云：「帝既平吳，大誥天下。其文曰：『仁義之舉，要在安民。弔伐之師，莫先去暴。惟我大越之國，實為文獻之邦。山川之封域既殊，南北之風俗亦異。自趙、丁、李、陳之肇造，我國與漢、唐、宋、元而各帝一方。雖強弱時有不同，而豪傑世未嘗乏。……社稷以之尊安，山川以之改觀。乾坤既否而復泰，日月既晦而復明。于以開萬世太平之基，于以雪千古無窮之耻。是由天地祖宗之靈，有以默相陰佑，而致然也。於戲，一戎大定，迄成無競之功，四海永清，誕布維新之誥，布告遐邇，咸使聞知。』」參見（越南）阮廌，《平吳大誥》，（越南）吳士連等，《大越史記全書》，收入陳荊和編校，《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センター刊行委員會，1984-1986），頁 546-548。

110（越南）潘佩珠，《後陳逸史》，〈序〉，頁 366。

潘佩珠以作家之筆來述說越南祖先們的抗明精神，以此來激起越南人民的抗法意志。而為了要凝聚國家民族的集體意志，潘佩珠以雄王作為「同胞」的想像的共同體之英雄來凝聚民族。他說：

此一國之人，寔皆此一種人類之祖之苗裔。我安南人即皆雄王之苗裔也。對於世界人，當然自成一族。對於我國人，尚何族姓之可別乎？同國所產即為同胞，乃天賦之原素，非人造所得而離異。明乎同胞之義，然後國家之義益圓滿而日進於強。蓋知同國為同胞，則知國人所享之幸福，寔為吾同胞之幸福。吾同胞所享之幸福，寔為吾自身之幸福。吾自身之幸福，必至於同胞榮樂，而真福幸乃可言。吾為同胞謀幸福，即犧牲吾身，有所不恤。非不愛身，愛身之至者也。蓋幸福被於同胞，其為吾身之快樂尊榮至矣。是以愛自身甚者，必愛同胞。愛同胞篤者，必愛國家。愛國家真者，必犧牲其一身自私自利之事，而以竭力於衛國。同胞之義，寔國家之元氣也。¹¹¹

潘佩珠認為越南人跟中國人一樣同屬黃帝子孫，這是相同的部分。至於相異的部分則是越南人皆是雄王的後裔，所以在世界上，越南民族是一特殊族群。此處也體現出潘佩珠的別華意識。這裡潘佩珠提出了民族國家、國家總體戰的觀念，他認為愛民族愛國家必須拋棄一己之私，努力為國家民族、同胞的幸福而奮鬥。

越南人雖然在文化上認同華文化，但政治上卻堅持國家獨立的立場。《後陳逸史》云：

能雖牢人，然甚慕華風，常至省城賣貨物，被吳官吏所侮辱，心啣之。至是歸附義軍，意殊踴躍。¹¹²

「能」這個人是越南少數民族牢族人。這裡講到甚慕華風，指的是越南省城的華風，可以看出越南人認為越南屬於華的範圍。「慕華風」也是中國宋朝對越南所做出的觀察，975年宋朝即以「夙慕華風，不忘內附」來形容越南領導人丁部領，並封其為「交趾郡王」。¹¹³

111 同上註，頁 401。

112 同上註，頁 416。

113 元·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 488〈交趾傳〉，頁 14058。

古代越南人一向認為越南有越南的天下，中國有中國的天下，強調自身的國家主體性。潘佩珠說：

今人經通姑渡，灑淚先朝，繫無窮之哀感焉。此中原故有舊史在，讀者能推而知之，無容饒舌。¹¹⁴

這裡的中原講的是越南的中原，非中國的中原，以展現出越南主體性的立場。而越南主體性也表現在土字的書寫上。通常漢字的寫作會受到中國思想觀念的影響，主要反映出越南士人的意識型態。而土字的運用則比較呈現出越南本土的思想及野史的傳遞。潘佩珠說道：

蓋我國當時寧平以南，識漢字者絕少。稗官野史，皆以土字載之。其後漢文傳播，朝廷科舉，趨重於漢文，我人國遂棄髦土字而不錄。土字失傳，人湮事晦，吾國人愛國愛羣之思想，日漸薄弱，淪胥至亡。由今回思，餘慟欲絕。予於二十年前，好與葵、襄土人結納，彼人不識漢文，但解土字。故氓遺老，樂向予談數百年前事，蓋從土字野史傳來者，予今述之，以告我國民。¹¹⁵

由於從前越南稗官野史多以土字（即喃字）記載，土字的失傳對越南民族精神的傳遞影響很大，由於漢字的書寫側重時越南士人的角度來書寫，無法完全反映越南民間的觀點，故潘佩珠與熟識土字的越南遺老交友，才更加瞭解數百年前越南的野史，這本《後陳逸史》很多材料也是從野史資料加以潤飾而來。

越南人也很了解自己 and 中國這個巨大他者之間的力量對比，對此潘佩珠提到越南能不被併吞維持獨立自主的原因，他說：

吳，越之不敵，婦孺能言之！吳之土地三十倍於我，吳之人民數百倍於我，然吳人郡縣我國，乃不能及二十年。以地理之毗連，軍情國勢之慣熟，而大小、眾寡、強弱之懸絕，又相天淵。然欲滅我種，吞我圻，埋沒我國號，尚不可得。我先人之有造於我後嗣，豈有微哉？¹¹⁶

114（越南）潘佩珠，《後陳逸史》，頁 446。

115 同上註，頁 446。

116 同上註，頁 446。

根據越南人的觀點，越南軍事上不如明代中國，這是連越南婦孺都知道的事情。中國不論領土或人口皆是越南的很多倍，但是明代中國統治越南卻不到二十年就被迫放棄了。以越中兩國作為地理上的陸上鄰國，且明代中國對越南的軍情國勢是很熟悉，再加上中越兩國在領土大小、人口多寡、綜合國力強弱等因素皆如此懸殊如天淵之別的情況下，明朝想要消滅越南的國家及人種仍然是不可得的。由此可見越南的祖先們對於讓越南保持獨立而沒被併吞的功勞是巨大的。潘佩珠對於歷史上多強調黎利一人的英雄事蹟頗不以為然，他認為越南之所以抗明成功主要是因為眾多無名英雄為國家奮鬥的結果，忽略他們正是背祖忘恩的表現，他說：

重光帝敗，黎太祖興，竟能掃平強吳，恢復故宇。讀史者皆能知黎太祖之偉烈豐功，為吾國英雄冠。而凡失敗之英雄，無名之英雄，所以分道揚鑣，區林斬棘，以引出此巍巍赫赫之大英雄。吾國民乃無一人能道之，甚哉！吾國民之忘祖也。¹¹⁷

一將功成萬骨枯，黎太祖黎利的復興越南成功，除了靠黎利個人的卓越領導力之外，更重要的是要靠千千萬萬越南的無名英雄們拋頭顱灑熱血所犧牲奮鬥換來的。過去《大越史記全書》、《皇越春秋》等史書及小說等著作強調的是以黎利為首的領導集團們的功勞，對許多基層的無名英雄們的事蹟較少著墨。因此，潘佩珠加以強調無名英雄們的集體貢獻。若以時代背景觀之，潘佩珠的用意是在以史為鏡，希望複製越南祖先們反抗中國成功的歷史經驗，激勵越南全民的抗法精神意志。而抗法若要成功，單靠少數領導人是無法順利達成的，必須有近代以來的「國民總體戰」的觀念，全越南人民的全體投入抗法戰爭，才有可能最終推翻法國的殖民統治，重現越南國家的榮光。關於越南人強調民族獨立的重要性，潘佩珠說：

吳平黎興，我人帝我國。¹¹⁸

他又說：

吾人讀史，於黎皇平吳復越之事，莫不踴躍歌誦。¹¹⁹

117 同上註。

118（越南）潘佩珠，《後陳逸史》，頁447。

我人帝我國是越南傳統的國家獨立觀念，也是歷史上多次擊退來自外來的入侵者的一個民族歷史基因，具有極深的心理意涵。歷史上越南人多次表達這樣的觀念，越南歷史小說《皇越春秋》以詩來表達出這個觀點，詩云：「南邦定是南邦主，北國還為北國臣。」¹²⁰ 宋越熙寧戰爭（1075-1077）時，越南李常傑（1018-1105）將軍沿江築柵固守，當時越南軍中流傳神諭云：「南國山河南帝居，截然分定在天書，如何逆虜來侵犯，汝等行看取敗虛。」¹²¹ 這個觀念讓越南人在歷史上擊退了來自元朝、明朝及法國、美國等強國的入侵，這種抗爭意識和堅強的國家獨立觀念確實是越南民族性的強韌及特殊之處。越南人對於黎利擊敗明朝恢復越南獨立之事皆歡喜踴躍，表現出越南人在政治上高度的主體意識。

主體意識不僅體現在越南與中國的關係上，在面對西風東漸的情勢下，西方文化的傳播讓越南社會陷入嚴重的危機。傳統文化正處於解體的邊緣，逐漸被西方物質文化所取代。潘佩珠希望拯救人性，恢復人心，鼓吹孔子的儒學思想，使傳統文化擺脫危機。他承認並肯定西方文明成就，特別是現代科學技術的價值，但他希望以現代化之儒教思想來作為越南精神文化的基礎，吸納並結合西方文明的精要，建設新的文化，打造新越南。¹²²

在人種及文化方面，潘佩珠具有中越同祖觀、中越兄弟觀；同時，在政治方面，他也具有獨立於中華的越南主體意識。於《平吳大誥》與《後陳逸史》中體現出越南傳統及潘佩珠的越南主體意識。以潘佩珠的觀點來看，越南與中國雖同為黃帝子孫，但越南又是雄王的後代，所以越南為有別於中國的民族，這是越南與中國「同中有異」的部分。

六、結 論

119 同上註。

120 見（越南）佚名，《皇越春秋》，頁 289。

121 （越南）吳士連等，《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 3〈李仁宗紀〉，頁 249。

122 Nguyễn Thọ Đức, “Tìm Hiểu Xu Hướng Hiện Đại Hóa Tư Tưởng Nho Giáo Trong Không Học Đẳng Của Phan Bội Châu,” pp. 37-57.

潘佩珠所處的時代正是處於越南歷史的轉折點上，在法國殖民與亞洲主義的背景下，他產生了強烈的抗法意識與行動，其一方面既浸潤於中國學者的觀點中，一方面又具東亞視角，故能形成深具特色之中華觀。

亞洲主義的內涵強調同文同種同洲，不論日本的曾根俊虎及大隈重信、中國的孫中山、越南的潘佩珠等人皆然。潘佩珠認為，越南是亞洲的文明古國，與中國並列為亞洲歷史最悠久的國家，而且在地理、歷史、人種、文化等各方面都跟中國有緊密的關係，具有高度的相關性。他不僅認為中越關係是兄弟之邦的關係，並認為中國是全亞洲的兄長，應該擔當起領導亞洲的重責大任。潘佩珠也認為越南人是漢人之種，在文化上認同漢文化，甚至認為自己是漢人。雖然潘佩珠認為越南與中國在血緣、文化、歷史、地理等各方面有非常親密關係，但是他仍然強調越南自身的主體意識。

總之，潘佩珠的思想中具有中越同祖觀及中越兄弟觀，同時越南也深具漢文化意識。因為是同祖生，所以彼此是兄弟國之關係，而且也都認同漢文化。至於越南的主體意識，如同兄弟分家之後，各自獨立經營發展自己的家業，潘佩珠雖然認同亞洲主義，主張中、日、越等國應共同合作，但他也與其他越南人一樣具有強烈的主體意識。這突顯出潘佩珠的雙元性中華觀，既有人種、文化上的漢人與漢文化認同，又有政治上獨立於中華的主體觀。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毛亨傳，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毛詩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0。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0。

元·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越南）吳士連等，《大越史記全書》，收入陳荊和編校，《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東京：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センター刊行委員會，1984-1986。

二、近人論著

于向東、梁茂華 2013 〈歷史上中越兩國人士的交流方式——筆談〉，《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3.4(2013.12): 108-116。

王志松 2016 〈漢字與東亞近代的啓蒙思潮——梁啓超與潘佩珠的《越南亡國史》〉，《漢字研究》14(2016.4): 103-121。

(日)白石昌也 1993 《ベトナム民族運動と日本・アジア——ファン・ボイ・チャウの革命思想と對外認識》，東京：巖南堂書店。

牟樹滋 1912 〈讀《聯亞葛言》有感〉，《順天時報》第 3189-3193 號，1912.9.24-25、1912.9.27-29，第 2 版。

呂小蓬 2013 〈潘佩珠漢文小說評述〉，《人文叢刊》8(2014.6): 285-290。

何純愼 2012 〈越南潘佩珠與台灣林獻堂民族思想之比較——以兩人與中國、日本的關係為中心的觀察〉，《慈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刊》14(2012.12): 27-43。

胡漢民 1978 《胡漢民先生文集》第 2 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徐善福 1980 〈潘佩珠研究（上）〉，《暨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0.3(1980.9): 34-45。

(日)桃木至朗 2011 《中世大越国家の成立と変容》，吹田：大阪大學出版會。

(日)狹間直樹著，張雯譯 2017 《日本早期的亞洲主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張政偉 2018 〈新民自尊——由梁啓超越南觀談起〉，《慈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刊》21(2018.10): 2-20。

張崑將 2015 〈越南「史臣」與「使臣」對「中國」意識的分歧比較〉，《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12.1(2015.6): 167-191。

(越南)陳輝燎 1973 《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北京：三聯書店。

陳益源、羅景文 2010 〈越南潘佩珠與日本、中國之深厚關係——以潘佩珠對於西方建國英雄事蹟的吸收與轉化為例〉，《漢學研究學刊（馬來亞大學中文系）》1(2010.10): 119-141。

梁啓超 1969 《飲冰室全集》，臺北：文化圖書公司。

《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1989 《國父全集》第 3 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

(日)黑木彬文，(日)鱒澤彰夫編輯、解說 1993 《興亜会報告・亜細亜協會報告》，東京：不二出版。

- (越南) 黃文草 2018 〈20 世紀初的越南學者對王陽明思想的研究〉,《王學研究》8(2018.11): 144-148。
- 楊瑞松 2010 《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臺北:政大出版社。
- (越南) 潘佩珠 《潘佩珠年表(抄本)》,河內: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院藏,編號: Vhv.2138。
- (越南) 潘佩珠 2010 《重光心史》,收入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 2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越南) 潘佩珠 2010 《後陳逸史》,收入孫遜、鄭克孟、陳益源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第 2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蔣為文 2017 〈越南民族獨立運動對台灣的啟發〉《臺灣國際研究季刊》13.4(2017.12): 75-92。
- 劉先飛 2011 〈東遊運動與潘佩珠日本認識的轉變〉,《東南亞研究》2011.5 (2011.10): 69-73。
- 鄧警亞 1978 〈中越革命志士組織「振華興亞會」,進行抗法鬥爭回憶〉,《廣東文史資料》22(1978.11): 205-219。
- 羅景文 2011 〈東亞漢文化知識圈的流動與互動——以梁啟超與潘佩珠對西方思想家與日本維新人物的書寫為例〉,《臺大歷史學報》48(2011.12): 51-96。
- 羅景文 2012a 「潘佩珠及漢文小說之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羅景文 2012b 〈潘佩珠研究述評(1950-2010)及其漢文小說研究之意義〉,《國家圖書館館刊》101.1(2012.6): 165-194。
- 羅景文 2012c 〈召喚與凝聚——越南潘佩珠建構的英雄系譜與國族論述〉,《成大中文學報》37(2012.6): 159-186。
- 羅景文 2018 〈2010 년 이후 中文學界 潘佩珠 연구 성과에 대한 고찰——潘佩珠 관련 조직과 인물의 재중국 활동 양상과 더불어〉(〈對 2010 年後中文學界研究潘佩珠之成果的觀察——兼論與潘佩珠相關之組織和人物在華活動情形〉),《漢文學報》38(2018.6): 257-356。
- 羅景文 2020 《憂國之嘆與興國之想——越南近代知識人潘佩珠及其漢文小說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 Chuong, Thâu 章收. 1967. “Tình Hình Nghiên Cứu Phan Bội Châu từ Trước đến Nay 從過去到現在關於潘佩珠的研究情形.” *Nghiên Cứu Lịch Sử* 歷史研究

- 104(1967.11): 6-16.
- Chương, Thâu. 1993. “Một Số Vấn Đề Cần Tiếp Tục Nghiên Cứu về Phan Bội Châu 一些關於潘佩珠必須繼續研究的問題.” *Thông Tin Khoa Học Xã Hội* 社會科學通訊 1993.1: 56-62.
- Chương, Thâu. 2004. *Nghiên Cứu Phan Bội Châu* 潘佩珠研究, Hà Nội 河內: NXB Chính trị quốc gia 國家政治出版社.
- Chương, Thâu. 2008. “Về Tình Hình Nghiên Cứu Phan Bội Châu ở Nước Ngoài Những Năm Gần Đây 近年來關於國外研究潘佩珠的情形.” *Nghiên Cứu Văn Học* 文學研究 2008.4: 3-14.
- Duiker, William J. 1971. “Phan Bội Châu: Asian Revolutionary in a Changing Worl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1(1971.11): 77-88.
- Marr, David G. 1971. *Vietnamese Anticolonialism 1885-1925*.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Nguyễn Thọ Đức 阮壽德. 2011. “Tìm Hiểu Xu Hướng Hiện Đại Hóa Tư Tưởng Nho Giáo Trong Khổng Học Đăng Của Phan Bội Châu 潘佩珠《孔學燈》中儒教思想的現代化趨向探討.” *Tạp Chí Hán Nôm* 漢喃雜誌 109(2011.12): 37-57.
- Phan Bội Châu 潘佩珠. 1990. *Phan Bội Châu Toàn Tập* 潘佩珠全集. Chương Thâu 章收, ed. Huế 順化: Nhà Xuất Bản Thuận Hóa 順化出版社.
- Phan Bội Châu. 2001. *Phan Bội Châu Toàn Tập* 潘佩珠全集. Chương Thâu, ed. Tập 1-3, 5. Huế: Nhà Xuất Bản Thuận Hóa; Hà Nội 河內: Trung Tâm Văn Hóa Ngôn Ngữ Đông Tây 東西語言文化中心.
- Trần, Nghĩa 陳義. 1970. “Nhìn Lại Tình Hình Nghiên Cứu về Phan Bội Châu 回顧潘佩珠的研究情形,” 收入 (越南社會科學委員會) Viện Văn Học 文學研究所編, *Nhà Yêu Nước và Nhà Văn Phan Bội Châu: Kỷ Niệm 100 Năm Ngày Sinh Phan Bội Châu* 愛國者與作家潘佩珠——潘佩珠百歲誕辰紀念論文集. Hà Nội: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社會科學出版社, pp. 321-352.
- Wittgenstein, Ludwig. 1963.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Oxford: Blackwell.

The Binary Nature of the Vietnamese Patriot

Phan Bội Châu's View of Zhonghua

Chang Che-ting*

Abstract

Since the mid-19th century, the nations comprising East Asia have been greatly affected politically, economically, and culturally by Western imperialist countries, and as a result, intellectuals throughout East Asian nations attempted to apply Western knowledge to save their countries, among which in Vietnam, Phan Bội Châu 潘佩珠 (1867-1940) was typical. During the time of rising French colonialism and Pan-Asianism, he developed an unusual view of Chines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Zhonghua for his time. My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Pan-Asianism as proposed by Phan Bội Châu, Sone Toshitora 曾根俊虎 (1847-1910), Ōkuma Shigenobu 大隈重信 (1838-1922), and Dr. Sun Yat-sen 孫中山 (1866-1925) all emphasized the commonality of culture and of biological origin among Asian countries. Phan thought Vietnam was one of the countries with a long tradition similar to China and closely resembled China in terms of geography, historical development, biological origin, and culture, even believing he belonged to the Han ethnic group. Not only maintaining Vietnam and China were closely related like brothers, Phan also regarded China as the elder brother and thus should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leading Asia. Influenced by Vietnam's "double" tributary system, namely Vietnam fell under China's tribute system whereas neighboring nations paid tribute to Vietnam, Phan expected that while China—as the elder brother of Vietnam—was the leader of Asia, Vietnam—as

* Chang Che-ting,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younger—should lead both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The thought of Phan embodied the views that Vietnam and China were of the same ancestry and were brothers; Vietnam's culture was Han culture. As for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Vietnamese people, Phan, like many others, also regarded Vietnam a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and China and Vietnam were essentially two brothers following “family division.” To conclude, the present study exposes that Phan's idea of China-Vietnam relationships were a binary: on one hand biologically and culturally connected, and on the other, politically independent.

Keywords: Vietnam, Phan Bội Châu 潘佩珠, Zhonghua 中華, East Asia, Pan-Asianism